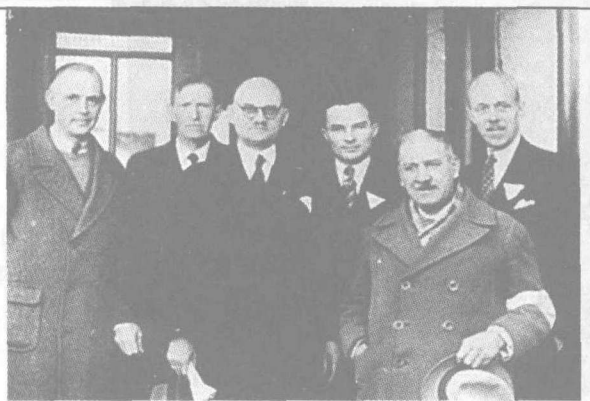


美国侨民



◀1937年南京大屠杀前后,在华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南京委员会部分成员。左起:福斯特、米尔斯、拉贝、斯迈思、施佩林、菲奇。

眼中的美国对日外交政策

徐立刚

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发生后,留在南京的美国侨民积极投身于救济保护难民的工作,对日军的野蛮暴行竭尽所能予以抗议、阻止和揭露,他们是南京国际安全区的骨干力量。不仅如此,有些美国侨民还对自己国家政府姑息纵容侵略(即对日本侵略中国长期采取所谓“中立”政策)的对日外交政策进行批评,在国际关系方面表现出可贵的正义感与敏锐的政治眼光。

美国基督教圣公会牧师、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秘书福斯特在1938年2月10日致家人函中,回顾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来的历史教训,有力地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。

福斯特认为政府的对日政策应做出积极稳妥的新选择。“我希望美国不要卷入战争。这儿尚未发生任何需要(美国)迈出这一步的事情;但我觉得如果英国和美国采取其他措施——例如经济或政治压力,那么日本就不敢肆意妄为。”他觉得对日政策早就应当改弦更张。“这种行动其实早在1931年日本刚刚开始疯狂进犯(中国)时就应采取了,事实却是当时的疯狂导致了今天的混乱。”福斯特指出美英等国姑息纵容日本侵略的错误始于“九·一八”事变,对于7年来日本侵华战争步步升级的状况负有责任。“假如外国势力立场更坚定,假如满洲里的国联调查委员会明确宣布日方是错误的,那么过去7年的历史就会大不一样。”

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、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秘书斯迈思博士在1938年3月8日致朋友函中,批评起美国姑息纵容侵略的外交政策来显得锋芒毕露,对现实与未来分析得十分透彻。

斯迈思从长远考虑,分析权衡利弊得失,替美国政府找出明智的新选择。“如果我们不想在集体军备这条路上走得太远,就应对侵略行为进行国际经济制裁,以保证世界安全。但我们担心那也会导致战争,而我们由于担心而踟蹰,亦会导致战争!”

斯迈思指出,无论从道义上讲还是从未来的国家利益上

讲,美国都应当抛弃姑息纵容侵略的中立政策。“我们应该唤起世界上所有的国家,让他们起来揭示道义的公正。斯坦利·琼斯对于道德比我阐述得更清晰!要么世界上的国家应为更好的国际秩序而携手合作;要么大家都将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无政府主义世界。”

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、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贝茨博士在1938年11月29日致朋友的传阅函中,指出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恶果、南京舆论的反应,对其政策进行了十分生动而辛辣的批评。

贝茨以南京活生生的现实,揭露美国对日政策在中国造成的恶果。“南京城内的美国和平主义者,其生活也是严峻的。他们连续数日亲眼目睹成百架(日本)轰炸机成群飞过,有些(飞机)带有美国(军事)装备,而且几乎全部(飞机)灌满美国汽油。在江上连绵的(日本)军舰是用美国汽油驱动的;公路上数以百计的(日本)军用卡车也是通用公司和其他美国厂家制造的。”

贝茨指出由于美国姑息纵容侵略的不光彩表现,在美国支持政府这种政策的和平主义者受到南京中外人士的谴责。“他们在美国的和平主义者友人正受到谴责,因为害怕法西斯国家不高兴,(美国)断然反对通过国际合作走向世界政府蹒跚的第一步,反对取消与侵略者的经济伙伴关系,从而使世界上的弱国横遭蹂躏。难道善意对于他人还有什么胜于强权的实际意义?”而美国不愿得罪法西斯国家,是谋求自身平安,并指望他们把侵略矛头对向苏联。

在南京的美国和平主义者面对外交政策的恶果和舆论谴责,内心感到压力。贝茨从道义上进行批判与呼吁:“富国应该为大家的公益作经济调节,而不应以武装的贪婪掠夺他们弱勢的邻居。”

这几位美国侨民的分析评说富于正义感,不乏真知灼见,其正义感与远见令人敬佩。

(本文作者为江苏省档案局副研究员)